

論粵語在香港法律中的地位

許名瀚

香港大學

提要

粵語是大多數港人的母語，而港人使用粵語口語亦屬基本人權。香港法律將中文定為法定語文，但沒表明粵語口語是否中文的口語表達方式；全國性法律亦只為普通話賦予地位，未有提及粵語及其他漢語方言。究竟粵語在香港法律中有何地位？本文先分析《法定語文條例》的立法原意及歷年的修訂，再闡述法院在判例中對該條例的理解，探討《法定語文條例》及法庭判例有否確立粵語的法律地位，並就如何能更佳地保障港人使用粵語之權利略申管見。

關鍵詞

粵語，語言權利，法律解釋，法定語文，程介南案

1. 引論

粵語屬七大漢語方言之一，亦是粵、港、澳及廣西省部分地區民眾共同的交際工具（詹伯慧 1990: 8）。粵語內部又可劃分為七片（鄧思穎 2020），在香港通行的粵語則是廣府片，是粵語中最具影響、使用人數最多的一片（伍巍 2007: 170）。粵語與其他漢語方言一樣，有書面語和口語兩種表達形式；而市民在生活各層面上中，不論是日常溝通，還是媒體廣播、公務和議會論政，採用之語言皆以粵語口語為主。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8: 92–94）的統計，88.8%的居港人士母語為廣州話，而在日常溝通（即與配偶溝通、與子女溝通、與父母溝通及與朋友交談）必定、經常或間中使用粵語者，高達 90.6% 至 95.7%，在娛樂（即看電視、看電影、聽歌及唱歌）時必定、經常或間中使用粵語者，亦高達 88.7% 至 93.9%，可見粵語非常普及，亦是現時香港社會最流通的語言。

然而，粵語並非國家語言規範化的對象，既不是標準語，也不是規範語（湯志祥 2013: 30–31），因為今天只有普通話才是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和“現代漢語標準語”（宋欣橋 2014: 228）。故此，在國家法律上，粵語和其他漢語方言一樣，一直未獲賦予法定地位，更遑論有官方的語音、語法及詞彙標準。而在本地的層面上，香港昔日為英國的殖民地，故香港自 1842 年開埠起法定語言只有英文，粵語的使用一

直未受重視或認可；直至 1974 年，香港政府透過訂立《法定語文條例》（下稱“《條例》”），將中文定為法定語言，¹ 但又沒有為“中文”下明確的定義。粵語口語作為中文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又是否《條例》中“中文”的其中一種或唯一一種口語表達方式？學者馬毛朋（2018: 124–128）嘗指出，香港法例中眾多含“中文”一詞的條文顯示“中文”可指口語，又以法律學者的分析為據，指出粵語是香港司法實踐的口語形式。這些推論不無道理，惟在法律角度而言，眾多法例中“中文”可指口語，並不等於《條例》中的“中文”必然指口語，因為同一詞彙於不同條例中的意思，會因為立法原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另外，法律學者不論本身有多權威，其對法律條文的分析和詮釋只要未經法庭採納，亦不會成為具約束力的法律解釋。是故，對於現行法律有否承認粵語之法定地位，至今仍存有灰色地帶。

有見及此，本文將探討粵語在今天香港法律中的地位。本文將結合法律研究的方法，先指出使用母語為人類的基本權利之一，香港自回歸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稱“《基本法》”）亦已開宗明義地給予“中文”法定語文的地位，故香港的法律條文應當保障港人使用粵語之權利，而此舉亦有利國家發展。隨後，本文會運用普通法制度中的法律解釋方法——目的解釋，透過分析《條例》的立法原意及歷年來的修訂，探討《條例》設立的目的除廣泛地確立“中文”為法定語文外，有否包括確立粵語的法律地位。本文其後的部分，亦將分析香港法院在判例中對相關法律的理解，探討香港法院有否在具法律約束力的判例中確立粵語的法律地位。最後，本文將總結粵語在今天香港法律中的地位，以及在法律層面上港人使用粵語之權利如何能更受保障。

2. 使用粵語為港人之語言權利

2.1. 語言權利是國際社會認可的基本人權

語言是人類社會中主要的溝通媒介，亦是構成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而母語在人生發展和群體的語言保持（*language maintenance*）中佔有重要地位，蓋因人的首要需求之一就是充分表達自我的能力，而母語為一個人進行自我表達的天然工具（李宇明 2005: 169）。在過往數十年，使用母語的權利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議題，此權利亦成為國際公約的內容，如 1966 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 27 條表示凡屬語言少

¹ 《法定語文條例》第 3 條第 1 款。

數團體之人，與團體其他分子共同享受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United Nations 1966）；²1996年通過的《世界語言權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第3條第1項更明言個人於私下或公開場合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不容割讓，並得以於任何情況中使用（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Follow-up Committee 1998: 24）。³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2015）指出，現今國際社會強調的語言權利（linguistic rights），箇中要義正是保障個人或團體在私下或公開場合自由選擇語言的權利。⁴

由此可見，民眾在任何場合使用自己的母語，實屬基本的語言權利，不容剝奪。套用至香港社會，以粵語為母語的大多數港人在日常生活中自由使用粵語，亦屬基本的語言權利，不容剝奪。

2.2. 香港法律理應對港人使用粵語的權利作出充分的保障

上述語言權利及當中使用母語的權利不只是國際標準，對香港亦具約束力，因為上述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於1976年擴展至適用於香港；隨後，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實施，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正式以本地法律的形式反映在《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

- (1) 屬於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⁵

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此安排亦受《基本法》認可，因為《基本法》第39條第1款明確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法律予以實施。⁶

²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英文原文為：“In those States in which ethnic, 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 exist, persons belonging to such minorities shall not be denied the right, in community with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roup, to enjoy their own culture, to profess and practise their own religion, or to use their own language.”

³ 《世界語言權宣言》第3條。英文原文為：“...the following to be inalienable personal rights which may be exercised in any situation: ... the right to interrelate and associate with other members of one’s language community of origin.”

⁴ 英文原文為：“Linguistic rights protect the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right to choose one’s language or languages for communication both withi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pheres.”

⁵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8條，第二十三條。

⁶ 《基本法》第39條第1款。

此外，《基本法》第9條亦確認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⁷ 據屈哨兵(2021: 5)的分析，條文中“除……還可……”的句式隱含價值選擇，前方出現的“中文”是首先得到關注和提及的項目，後方出現的“英文”表示的僅為“添加”和“類同”。是故，港人使用“中文”的語言權利理應受到最高的關注。此外，由於《基本法》源於國家憲法，為香港的憲制性法律，在香港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0），任何本地法律皆不得抵觸之，⁸ 故與語言應用有關的香港本地法律，亦當與《基本法》中確立中文法定地位的原則相符，即應以明文保障港人使用中文（包括書面及口語形式）的權利。由於多數港人亦以粵語為母語，粵語亦是民眾在日常生活及工作場合中最常用的口語（屈哨兵 2021: 29），故港人使用粵語的權利亦理應受到法律明文保障。

2.3. 確立粵語地位對港人語言權利及國家發展皆有利

上文闡述以法律明文保障港人使用粵語權利的應然性。然而，《基本法》第9條雖對港人使用“中文”的語言權利作出了原則性表述，但“中文”概念模糊，既可指書面中文，又可指口語中文，當中後者更可指各種漢語方言，並不囿於粵語。綜觀全國，相對於標準語普通話而言，使用粵語進行日常溝通者，在全國僅佔少數。故此，在國家法律的層面上，粵語從未被納立保障的範圍，正如《憲法》第19條第5款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⁹ 將推廣普通話的工作正式納入法定位置（錢曾怡 2006），其他漢語方言並不包括在內；又如2001年通過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2條規定，只有普通話才是國家通用語言。¹⁰ 國家推動通用語言文字時以規範化和標準化為綱領，¹¹ 若沒有法律同時明文確立各地方言之地位，則民眾使用自己方言的權利便會不受保障。

有見及此，就本港的語言狀況而言，不論在國家法律還是本地法律的層面上，都需要法律明文確立粵語在香港的法定地位。這與國家語言規範化和標準化的政策並沒矛盾，因為在香港確立粵語地位，並不代表排斥普通話，二者大可並存，既以法律訂明粵語為中文的法定口語表達方式，又透過政策、教育等層面培養港人使用普通話的能力（錢曾怡 2006），兩方面並駕齊驅。此舉，方能保障港人使用母語之語言權利，方能有利粵語的傳承，方能在保持普通話全國標準語地位的基礎上，協調好普通話與粵語的關係，使二者各得其位，相得益彰（李宇明 2021: 2）。

⁷ 《基本法》第9條。

⁸ 《基本法》第8條。

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第5款。

¹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2條。

¹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1條。

有論者或認為在現今國家語言規範化、標準化的基調下，各地語言政策應以普通話為綱，以法律確立粵語等漢語方言在其所屬方言區的地位，誠屬多此一舉。筆者對此不敢苟同，因為共同語與方言本無排斥，共同語本亦由漢語方言組成。共同語與方言大可各司其職，推廣共同語既有利於國家統一，又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發展（程祥徽、田小琳 2015: 18–19）；另一邊廂，保護各地方言亦能使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得以傳承，使中華文化的多元化及多樣性得以發揚光大。此外，就粵語而言，其於當前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中更形重要，因為粵語不僅為多數港人的母語，也是大灣區諸市中不少民眾的母語；保護及傳承粵語，對於大灣區的內部交際、大灣區與其他地區的交往，以至在國際交流的氛圍下大灣區內和諧語言生活的構建（李宇明 2021: 2），也是關鍵的一環。是故，確立粵語地位對國家發展亦甚有裨益；多此一舉之說，實難成立。

3. 粵語在《法定語文條例》下不具官方地位

從上一部分可見，在法律中明文確立粵語的地位，實能保障港人使用母語之權利，也對國家發展有利。可惜的是，香港法律中確立中文為法定語言的《法定語文條例》（下稱“《條例》”），本身並不具確立粵語法律地位這一原意或目的。本部分將以普通法法律解釋（statutory interpretation）的角度析論之。

3.1. 普通法法律解釋的原則與功用

香港素來奉行普通法制度。在普通法下，法律解釋（statutory interpretation）方法繁多，香港終審法院於2000年的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 v Chow Siu Shek David* 一案中歸納了三種主要方法，¹² 當中包括：

(1) 語意定律（literal rule），即以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為準，除非有其他因素顯示在該條文的立法原意下，條文應有其他意思；¹³

(2) 黃金定律（golden rule），即不論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是甚麼，都會假設法律條文不會造成荒誕的結果；¹⁴ 及

¹² [2000] 2 HKC 428 at 437G–437H.

¹³ 英文原文為：“The “literal rule” . . . accorded primacy to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legislation unless and until some other factor or factors demonstrated that some other meaning represented the true intention of the legislature.”

¹⁴ 英文原文為：“The “golden rule” . . . was that, whatever the literal meaning of the language which the legislature used, there was a presumption that it did not truly intend to bring about an absurd result.”

(3) 寬免意圖定律 (mischief rule)，即假設法律條文針對某種損害 (mischief) 而提供解決方法。¹⁵

而在香港，法律解釋的原則早有明文規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9 條，法律解釋須符合寬免意圖定律 (mischief rule)，即條例必須當作有補缺去弊的作用，解釋者須按其真正用意、涵義及精神，並為了最能確保達致其目的而作出公正、廣泛及靈活的釋疑及釋義。¹⁶ 香港法庭在判例中亦早已採納此方法，如在 *Town Planning Board v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Ltd* 一案中，終審法院指出：

(2) In Hong Kong, the purposive approach (including the mischief rule) has been reflected in s.19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 . . In applying a purposive approach to interpretation,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must first be identified.¹⁷ (在香港，包含寬免意圖定律的目的解釋方法已於《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9 條中反映出來。當法庭使用目的解釋的方法時，必須先分辨該條例的立法目的。)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1997 年發表的一份報告 (1997: 7, 241) 亦有相似的論述，將適用於香港的寬免意圖定律定義為“目的解釋”：

- (3) In Hong Kong. . . the mischief rule, which has been superseded by the term “purposive construction”, is incorporated into legislation. (1997: 7) (在香港，寬免意圖定律被“目的解釋”這術語取代，並已納入法例。)
- (4) The courts more truly give effect to the intention of Parliament when they adopt a purposive approach. The trend towards a purposive construction, rather than a literal construction, has given an impetus to the courts to use extrinsic aids to resolve a question of ambiguity in the legislation. (1997: 241) (法庭在採用目的解釋法律時，更能真確地反映立法原意。以目的而非語意作出解釋的趨勢，能給予法庭推動力以條例以外的文件解釋條例含糊之處。)

換句話說，香港法庭就本地法律進行解釋時，必須結合條例以外的文件，究其立法原意，以知條例訂立之目的，以及條例欲補之缺、欲去之弊。下文將上述法律原則

¹⁵ 英文原文為：“The “mischief rule” . . . presumed that the legislature has targeted a particular mischief and provided a remedy for it.”

¹⁶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9 條。

¹⁷ *Town Planning Board v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Ltd* [2004] 7 HKCFAR 1 at [29]–[30].

及方法應用至《條例》中，究其立法目的及原意，繼而推論確立粵語地位是否包含在立法目的及原意當中。

3.2. 《條例》立法目的在於建立香港雙語法制

在 1997 年 7 月 1 日之前，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法律制度一直沿用英國的普通法法制，不論法律條文、官方文件還是官方語言，皆唯英文獨尊。直至 1974 年，港英政府制定《條例》，宣布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¹⁸ 自此，中文才名正言順地有其法律地位，與英文享有同等的地位和待遇。

及後，在 1984 年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政府更著手完善香港的雙語法制，於 1987 年修訂《條例》，規定於 1989 年或以後生效之條例必須由中文和英文雙語制定，隨後律政署亦開始為 1989 年以前通過的法例草擬中文本（陳弘毅等 2013: 44）。中文隨後於 1990 年通過的《基本法》中亦被確立為正式語文：

- (5)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¹⁹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基本法》中定義中文為“正式”語文，與《條例》中的“法定”語文用詞不同，但由於正式語文與法定語文在法律的英文本中都是“official language”，故這裡可假設“正式”與“法定”是同義詞（馬毛朋 2018: 125）。整體而言，從《條例》制定後香港雙語法制的發展，可知《條例》的立法目的乃成為香港雙語法制設立的基礎，使中文能於官方文件中應用，與英文“平起平坐”，地位相等。

3.3. 《法定語文條例》的立法原意並不包括確立粵語地位

然而，雖然《條例》和《基本法》皆確立了中文為正式或法定語文，但“中文”的內涵仍有含糊之處，因為條文本身並無對“中文”作出定義；處理香港法例中的詞語和詞句釋義問題的《釋義及通則條例》亦只籠統地指出“法定語文”定義是“中文和英文”，²⁰ 對於“中文”的內涵沒有補充。是故，下文將採用上述“目的解釋”之法，了解《條例》的立法目的或原意是否同時有包含確立粵語成為“中文”的一部分，從而推論《條例》有否確立粵語的法定地位。

¹⁸ 《法定語文條例》第 3 條第 1 款。

¹⁹ 《基本法》第 9 條。相同條文亦見於上文第 2.2 部分。

²⁰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 條。

查考 1974 年 1 月立法會首讀《法定語文草案》的會議記錄（香港立法會 1974: 30），²¹ 主理草案的民政司黎敦義 (Denis Campbell Bray) 發言時指出：

- (6) The bill is nevertheless a meaningful statement of purpose and demonstrates the Government's earnest intention that language itself be no longer used as a pretext for any difficult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然而，這草案是具有意義計劃，能證明政府有認真的意圖，讓語言不再成為市民和政府之間溝通困難的藉口。)

及至二讀階段，政府進一步指出（香港立法會 1974: 23–24）²² 草案沒有提及或定義中文的口語形式是甚麼，並解釋其原因：

- (7) . . .the bill does not mention the spoke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 .this is becaus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bill is to state in broad terms the equal status of the two languages. It is intended that the use of dialect will be governed by the practicability of situations. (此草案沒有提及中文的口語版本……這是因為這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廣泛地提及中文和英文的平等地位。方言的運用將會按實際情況作出管理，這是我們所預期的。)

由此可見，政府完全意識到“中文”與“英文”一樣，可以包含口語形式，但認為《條例》不必明確規定“中文”與“英文”各自的口語形式，因為這與中文和英文各種方言的應用有關，而方言的使用應按實際情況作出管理，留有彈性。

面對議員隨後的質詢（香港立法會 1974: 24），²³ 政府亦只在會議上口頭確認粵語可作為“中文”的口語形式：

- (8) We fully recognize that Cantonese is the Chinese dialect used by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I would confirm that Cantonese will be used by the Government in its oral dealings with Cantonese speakers. Those who can only

²¹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會). 1974.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30 January 1974*. Hong 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²²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會). 1974.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13 February 1974*. Hong 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²³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會). 1974.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13 February 1974*. Hong 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speak other Chinese dialects will not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我們完全承認粵語為大多數香港市民使用的中文方言，並確認政府將會使用粵語與粵語使用者進行口頭的往來。我們不會歧視那些只能操其他中文方言的人。)

由此可見，政府故意只用口頭承諾的形式，確認與粵語使用者往來時會使用粵語，而不將其書於《條例》中；在法律上而言，政府在立法會會議中的口頭承諾本身並不具法律約束力。這導致後來通過的《條例》中，“中文”是否包含粵語口語的問題一直“留白”。從“目的解釋”之法分析，《條例》所補之缺、所去之弊，似乎只是當時操粵語的民眾與操英語的政府官員無法妥善溝通的問題，與確立粵語法定地位關係不大，粵語亦因此一直未得法律上的認可和地位。

這觀點亦見於政府在上述口頭承諾中對操其他漢語方言的人士的包容。政府明言不會歧視那些不諳粵語、只能以其他漢語方言（如客家語和閩語等）與政府往來的人，反映了《條例》的訂立的目的不是“獨尊粵語”，而是將所有漢語方言包含在“中文”的口語形式中，兼容並包。這一點，更能證明即使粵語作為多數港人的母語，其地位在《條例》中與其他漢語方言沒有分別。由此可見，雖然港人使用母語之語言權利應當得到保障，但相關保障並沒有在《條例》的制訂中得以實現。

3.4. 《條例》隨後的修訂亦無確立粵語地位之意

《條例》於1974年通過後，賦予中文與英文同等法律地位的第3條第1款曾於1995年被修訂。對比修改前後的條文，即可發現1995年當局對相關條文的修訂只是加入了“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一句，使第3條第1款變成現今的版本：

- (9) 現予宣布：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²⁴

而翻查當年立法會首讀《條例》修訂草案的會議記錄（香港立法會 1995: 45），即可發現此修訂的目的其實只是將“中文”這法定語文的應用擴展至法院程序，對“中文”一詞的具體含義並無觸及：

- (10) This clause enables a judge presiding over a court hearing to use either or both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but his choice of the language will not dictate what language a party, a legal representative, or a witness is to use. (本條（經修訂後的《條例》

²⁴ 《法定語文條例》第3條第1款。

第 3 條) 使法官能夠以兩種或其中一種法定語文進行審訊，但他的語言選擇並不能規定與訟各方、其法律代表或證人所用之語文。)

- (11) This reform will lead to the increased us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Hong Kong courts, as it will give an option to those people who feel that justice is best served by the use of Chinese, rather than English, in their cases. (這改革會令增加中文在香港法庭中的應用，因為此改革將給予認為使用中文最能彰顯公義的民眾，在自己的案件中選擇使用中文的權利。)

由此可見，第 3 條第 1 款的修訂只是旨在賦予法官選擇用中文或英文進行審訊的權力，以及賦予以中文為母語的民眾選擇以中文進行審訊的權利。在其實際意義上，這修訂只是擴闊了第 3 條第 1 款的適用範圍，沒有就“中文”一詞進行更深的討論或定義。這修訂的立法原意和目的，亦與確立粵語為法定“中文”的口語形式完全無關。

3.5. 粵語的應用只屬約定俗成

綜上所言，《條例》的制定及其後的修訂並無意正式確立粵語作為“中文”這法定語文的其中一種，又或是唯一一種口語形式。按“目的解釋”的法律解釋原則，政府或公職人員與民眾的事務往來，或是在法院程序上，使用的“中文”事實上可指使用粵語、普通話，又或是其他漢語方言；司法機構在一份 2002 年 11 月的立法會文件 (2002: 4) 中亦承認中文作為法定語文，“在口講的形式來說，通常是指廣東話，但也包括普通話在內”，將粵語的地位與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看齊，沒對粵語為多數港人的母語這一事實予以確認。

有人認為，以上的說法實屬矯枉過正，因為粵語之應用雖無法律明文規定，但粵語在香港的應用實質上並沒有任何障礙；現在所見大部分場合政府、公職人員和民眾皆用粵語溝通，如行政長官以粵語發表施政報告、立法會議員以粵語宣誓就職、法官以粵語宣讀判詞等，比比皆是。情況就如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曾於 2008 年 6 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形容旅客拿著行李在街上“吊吊掬”（香港立法會 2008: 32），“吊吊掬”便是粵語獨有的形容詞，意指在半空晃蕩或沒著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14），整句在會議記錄中有被記載；又如法官吳蕙芳於 2018 年 1 月就一宗刑事案件作出判決時，亦曾批評身為法律系畢業生的被告“你讀咁多書，廢嘅！格衰，讀幾多書都有用”（東方日報 2018），當中“咁多”、“嘅”、“格衰”和“有用”等，皆是粵語獨有的詞彙或短語，這些字句在法庭謄本中均被全盤記載。²⁵

²⁵ 根據法庭慣例，所有法庭程序均會被錄音，聆訊內容亦會按錄音製成謄本。

但是，這些習慣其實全部只是約定俗成，法律基礎欠奉，而眾人的行為習慣本身在香港亦不能成為法律。只要有一天《條例》中“中文”一詞被詮釋為只有普通話或其他漢語方言，港人使用粵語之權利即岌岌可危，上述粵語自由應用之況亦可能不復見，屆時粵語之普及與傳承則危在旦夕。

4. 香港法庭在判例中亦沒有確立粵語的地位

4.1. 判例在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香港在回歸後沿用英國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在普通法的“判例法”原則下，法庭判例為法律的一部分，且對下級法院有法律約束力。²⁶ 故此，在粵語地位這一議題上，雖然法例沒有明文確立粵語地位，但如香港法院在過往的判例中曾論及粵語的法律地位，又或是對“中文”二字作出詮釋，則粵語在香港法律下的地位，仍可憑判例知端倪。

4.2. 法庭判例只將粵語的應用賦予假定性質

然而，可惜的是，與《條例》的應用有關的判例實在不多；當中曾直接論及粵語地位或對“中文”二字作出詮釋者，更只有程介南案，²⁷ 其餘的判例主要都是著眼於法官如何在法庭程序中行使酌情權使用中文審訊（陳漢榮案），²⁸ 或是大學應否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李耀基案），²⁹ 對粵語的討論不多。

而細讀程介南案，更可發現法庭判例亦同樣對“粵語”在香港的獨特地位不予確認。在案中，以母語為粵語的被告要求案件由雙語法官審理被拒，故提出司法覆核。法庭在裁決此案時曾論及“中文”的定義，作出以下的評論：

(12) Assuming that Chinese means, in Hong Kong, the language of the majority, namely Cantonese, as opposed to the other languages and/or dialects that fall under the description of ‘Chinese’, it means that our courts allow for two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 spoken form: English and Cantonese.³⁰ (假設中文在香港是指大多數人所使用的語文，即廣東話，而不是指可歸類和稱之為“中文”的其他語文及 / 或方言，那就是說法庭容許的兩種法定語文的口講形式是英文和廣東話。)

²⁶ 此乃普通法中的判例法（*stare decisis*）。

²⁷ *Re Cheng Kai Nam Gary* [2002] 1 HKC 41.

²⁸ *HKSAR v Chan Hon Wing* [2020] 4 HKC 354.

²⁹ *Li Yiu Kee v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HKCU 171.

³⁰ *Re Cheng Kai Nam Gary* [2002] 1 HKC 41 at 44G.

這評論指出，假設粵語是大多數港人使用的語文，法庭就會接納粵語作為“中文”這法定語文的口講形式。粵語是大多數港人使用的語文，亦是他們的母語，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法庭加上表示假設的連詞“假設”（*assuming*），使整段評論欠缺裁定之意味及效果。故此，法庭在此案的判例中沒有提及粵語是大多數港人使用的語文這一事實，更沒有藉此就“中文”的口講形式作進一步的定義或詮釋，實屬可惜。

4.3. 法庭判例未有確立民眾使用粵語之權利

除將粵語應用賦予假設性質外，法庭在程介南案中亦未有確立港人使用粵語之權利。法庭在判詞中指出，語言權利與基本正義理論 (*principles of fundamental justice*) 不同，因為語言權利的起源與目的也與基本人權不同；³¹ 因此，使用粵語的被告人擁有基本的公平審訊權利 (*right to fair trial*)，並不代表其有權利要求案件由懂粵語的雙語法官審理；不論該法官是否通曉粵語，只要其是出於好意 (*good faith*) 作出合理的判決，其就該案審訊語言的判決便沒有被挑戰的理由。³²

此判決隨後在江麗華案³³及陳漢榮案³⁴中亦被採納，當中在陳漢榮案，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更補充與訟雙方在《條例》下選擇法庭語言的權利，並不意味法庭有對等的責任 (*reciprocal obligation*) 去讀和說該種語言。³⁵

從上述案例可見，使用哪一種語言（即中文或英文）進行審訊全屬法庭的酌情權，與訟各方的要求不一定會被法庭接納，意願也不一定會被法庭尊重。事實上，據司法機構於1998年發出的指引（1998: 2），法官在運用酌情權決定在程序的某部分中使用某種法定語文時，須考慮以下九項因素：

- (1) 被告或訴訟人的語文能力；
- (2) 證人作供時所用的語言；
- (3) 被告或訴訟人的意願；

³¹ *Re Cheng Kai Nam Gary* [2002] 1 HKC 41 at 48C–48D. 英文原文為：“...the court affirmed that language rights are a particular kind of right, distinct from the principles of fundamental justice, having a different origin and purpose. I concur.”

³² *Re Cheng Kai Nam Gary* [2002] 1 HKC 41 at 50G. 英文原文為：“Provided he does that and makes a rational decision in good faith I fail to see how the exercise of his discretion can be challenged.”

³³ *HKSAR v Kong Lai Wah* [2009] 1 HKC 459.

³⁴ *HKSAR v Chan Hon Wing* [2020] 4 HKC 354.

³⁵ [2020] 4 HKC 354 at 361A–361B. The relevant paragraph quotes, “The right to employ or utilize the language by a legal representative does not imply a reciprocal obligation on the part of the court to speak and read the language concerned.”

- (4) 被告或訴訟人指示代表律師其選擇的權利；
- (5) 被告或訴訟人代表律師的語文能力；
- (6) 爭辯中所涉及的事實問題；
- (7) 爭辯中所涉及的法律問題；
- (8) 需要翻譯成為另一種法定語文的文件數量；及
- (9) 法官或司法人員自己的語文能力。³⁶

在上述九項因素中，與訴訟人自身語言權利相關的（即訴訟人的語文能力、意願及其指示代表律師其選擇的權利）只佔其三（下稱“**訴訟人因素**”），與訴訟人無關的外在因素則佔其六（下稱“**外在因素**”）。據筆者日常從事法律工作的觀察，外在因素往往更能影響法官對於審訊語言的裁決。如案件牽涉法律問題的爭辯、有大量英文書面證供（**documentary evidence**）或有證人須以外語作供，又或是案件屬於某法律領域，而該法律領域的案件本身由不諳粵語的外籍法官審理，法庭多會決定以英文進行審訊，而不會基於**訴訟人因素**而決定以中文進行審訊；若訴訟人堅持使用中文，法庭則會為其安排傳譯，而維持以英文進行審訊。

有論者亦認為上述情況並無不妥，因為法庭一向設有傳譯服務，當審訊以英文進行而各方以粵語作供或陳詞，傳譯員自會將訴訟人的粵語陳詞及證供譯成英文供法官理解，又或是將法官的英文陳述譯成粵語供訴訟人理解。惟筆者對此未能苟同，因在翻譯角度而言，任何兩種語言之間並不完全對等；加上粵語詞彙複雜多樣，部分詞亦可有多重意義，當各方在庭上運用較地道的粵語詞句（如俚語“大石砸死蟹”及“阿崩叫狗，愈叫愈走”、形容詞“號礮緯嘞”及“走趯”等）時，不論翻譯人員的技巧有何高超，都難以用英文完全表達箇中意義。最終，訴訟人的粵語證供和陳詞不能被法官以母語直接理解，因而未能在法官的裁決中完全反映出來；另一邊廂，法官的英語陳述亦未能被訴訟人以母語直接理解，以致訴訟人未能就法官的陳述作出應有之陳詞或回應。

綜上所言，《條例》已確立在法庭程序中使用中文的權利，而法庭在判例中亦已意識到各方的語言權利；然而，法庭從判例中未有承認其有“讀”和“說”粵語的對等責任，加上法庭在決定審訊語言時往往奉**外在因素**為圭臬，未有格外重視與訴訟人語言權利有關的**訴訟人因素**，以致未能確保以粵語為母語的民眾在法庭上有面對“全粵語”審訊環境（即審訊所有環節皆以粵語進行，訴訟人的粵語陳詞能直接被法官了

³⁶ 此乃香港司法機構（1998: 2）指引中九項因素的中文譯本，可見於香港司法機構（2002: 2-3）。

解，反之亦然)的權利。³⁷以小見大，可知在現時的氛圍下要法庭透過判例在整體香港社會的語言運用方面確立民眾使用粵語的權利，路途仍然遙遠。

5. 總結

語言權利為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人權，當中包括人類使用母語進行日常事務之權利。這些權利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世界語言權宣言》等國際文件被廣泛承認，而香港亦是承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地區之一，在本地層面亦透過《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予以實施。

然而，多數港人之母語為粵語，粵語口語亦是民眾日常生活的通用語言，但港人以粵語進行日常事務之語言權利，卻一直保障欠奉。香港自成為英國殖民地始，素以英文為法定語言，中文及粵語一直不具法定地位。及至 1974 年，港英政府制定《法定語文條例》(下稱“《條例》”)，明文賦予中文法定語文之地位，使中文與英文在應用上平分秋色，地位平等。惟“中文”一詞，定義廣闊，在語言學上亦有書面語和口語之分(馬毛朋 2018: 125–128)，而口語亦可再細分為各種方言；當局一直未就“中文”定下明確的定義，亦未以在法律層面上確立粵語為“中文”的法定口語形式。透過香港法律中通用的法律解釋方法——目的解釋，探討《條例》之立法原意和目的，即可知悉其用意只在為建立香港的雙語法制定下基礎，以及改善當時外籍官員與民眾語言不通之問題，與確立粵語之地位關係不大；加上《條例》並沒有否定普通話和其他漢語方言作為“中文”的口語形式，粵語並沒有因為《條例》的制訂而得到正式的法律地位。《條例》第 3 條第 1 款隨後於 1995 年的修訂，亦只旨在擴闊中文的應用範圍，亦與確立粵語地位，又或是釐清“中文”之定義，毫不相干。

除《條例》外，本文亦嘗試探討法庭在過往的判例中對《條例》的詮釋，因為在普通法制度的“判例法”下，法庭判例中的裁決理由為法律的一部分，對下級法院具約束力。觀乎法庭判例，香港法庭雖在程介南案中論及粵語是指大多數人所使用的語文，在香港亦是中文的口講形式，但相關論述帶假設性質，在法律上沒有約束力，實屬可惜。從法庭在該案對法庭審訊語言的論述中，更可見其未有確立民眾在庭上有面對“全粵語”審訊環境之權利；以小見大，估計要法庭透過判例確立粵語在香港法律中的地位，路途仍然遙遠。

³⁷ 另外，根據現時法庭的慣常做法，如審訊以粵語進行，法官多會以符合現代漢語標準的中文書面語撰寫判案書，又或是先撰寫英文本，再由翻譯員譯為中文書面語。在庭上使用的粵語口語與在判案書中使用的中文書面語語義或有分歧，當中或會涉及翻譯學的議題。本文礙於主題及篇幅所限，暫未對此問題詳加探討，寄望未來學界能有更多相關的討論。

由此可見，粵語至今依然欠缺其應有之法定地位，民眾使用粵語之權利亦欠缺全面的保障。雖然粵語在香港的應用今天仍甚為廣泛，惟此等境況只屬約定俗成，應用粵語之權利本身並無法理基礎。法律沒明文確立口語形式的“中文”的定義，這代表“中文”的定義可有不同演繹，可以是粵語，可以是普通話，也可以是其他漢語方言；若未來“中文”的定義中不包含粵語，則多數港人使用母語進行日常事務之權利將岌岌可危，實在不利粵語之普及與傳承，也不利國家發展，因為粵語與普通話兼容並包，對經濟、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發展上，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有見及此，筆者寄望他日本地法律的框架能有所突破，使粵語能以“中文”的口語形式獲賦予法定地位；更甚者，全國性法律能有所更張，明文保障各方言區的民眾在國家推廣普通話的進程中，猶能享有使用各自的母語方言的權利。此舉，方能使港人使用母語之權利得到全面的保障，方能使粵語之傳承得到穩定的空間。

附錄

法律條文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釋義及通則條例)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Standard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Langu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 (法定語文條例)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世界語言權宣言)

法庭判例

HKSAR v Chan Hon Wing [2020] 4 HKC 354

HKSAR v Kong Lai Wah [2009] 1 HKC 459

Li Yiu Kee v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HKCU 171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 v Chow Siu Shek David [2000] 2 HKC 428

Re Cheng Kai Nam Gary [2002] 1 HKC 41

Town Planning Board v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Harbour Ltd [2004] 7 HKCFAR 1

鳴謝

本文原文為筆者修讀中國語言文學文科碩士課程期間撰寫的第一篇論文。感謝蕭敬偉博士就本文選材不吝賜教，更鼓勵筆者挑戰自我，參加第二十五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並將本文投稿至《中國語文通訊》。

此外，筆者在投稿後承蒙匿名評審員的寶貴意見與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Chen, Hongyi (陳弘毅), Wenmin Chen (陳文敏), Xueqing Li (李雪菁) & Wenhui Lu (陸文慧) (eds.). 2013. *Xianggangfa Gai Lun*, xinban 香港法概論 (新版)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Cheng, Xianghui (程祥徽) & Xiaolin Tian (田小琳). 2015. *Xiandai Hanyu*, xiudingban 現代漢語 (修訂版) Taipei: Shulin Chuban youxiangongsi. Taipei: Bookman Bookstore 台北: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20. Xianggang yueyu yu Xianggang zhongwen 香港粵語與香港中文 *Zhongguowenhua Yanjiusuo Tongxun* 中國文化研究所通訊 3. <http://cloud.itsc.cuhk.edu.hk/enewsasp/app/article-details.aspx/3F9EC4AB55F2587DE6FC93456272D7B3/> (accessed 27 February 2022).
- HKSAR Government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9. *Thematic Household Survey Report No. 66*. Hong Kong: HKSAR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 Hong Kong Judiciary (香港司法機構). 1998. *Use of Chinese in Court Proceedings – Guidelines for Judges and Judicial Officers*. Hong Kong: Judiciary.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會). 1974.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30 January 1974*. Hong 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會). 1974.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13 February 1974*. Hong 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香港立法會). 1995.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24 May 1995*. Hong Ko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 Li, Yuming (李宇明). 2005. *Zhongguo Yuyan Guihuailun* 中國語言規劃論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i, Yuming (李宇明). 2021. Hao feng ping jie li song wo shang qing yun 好風憑借力 送我上青雲 In Shaobing Qu (屈哨兵) (ed.), *Yuegangaodawanqu Yuyan Shenghuozhuangkuang Baogao 2021* 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202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Ma, Maopeng (馬毛朋). 2018. Lun Yueyu shi Xianggang zhengshi, fadeng yuwen (Zhongwen) de biaoda xingshi 論粵語是香港正式、法定語文 (中文) 的表達形式 *Zhongguo Yuen Tongxun* 中國語文通訊 97(1). 121–131.
- Minority Rights Group International. 2015. Linguistic Rights. <https://minorityrights.org/law-and-legal-cases/linguistic-rights/> (accessed 28 February 2022).
- Oriental Daily (東方日報). 2018. Judge: No use studying that much! Bad personality! Law graduate facing sentence for assaulting girlfriend while being drunk 官: 讀咁多書廢嘅! 格衰! 法律畢業生醉打女友候懲.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80113/00176_111.html (accessed 27 February 2022).

- Qian, Zengyi (錢曾怡). 2006. Tuiguang Putonghua he baohu fangyan 推廣普通話和保護方言.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128/moe_2326/moe_1144/tnull_14359.html (accessed 27 February 2022).
- Qu, Shaobing (屈哨兵). 2021. Yuegangaodawanqu jianshe zhong de yuyan wenti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語言問題 In Shaobing Qu (屈哨兵) (ed.), *Yuegangaodawanqu Yuyan Shenghuozhuangkuang Baogao 2021* 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生活狀況報告 2021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Song, Xinqiao (宋欣橋). 2014. Qian tan Xianggang Putonghua jiaoyu de xingzhi yu fazhan 淺談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 *Jishiguangyi (Si Ji): Putonghua Xue yu Jiao Jingyan Fenxiang* 集思廣益 (四輯)：普通話學與教經驗分享. 227–236.
- Tang, Zhixiang (湯志祥). 2013. Chong lun zai quanqiu shiye xia yueyu de diwei, gongneng yu zuoyong 重論在全球視野下粵語的地位、功能與作用 *Beifang Yuyan Luncong* 北方語言論叢 3. 24–35.
-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1997. *Summary: Report on Extrinsic Materials as an Aid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 United Nations. 1966.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mechanisms/instruments/international-covenant-civil-and-political-rights> (accessed 27 February 2022).
-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Follow-up Committee. 1998.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Barcelon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Linguistic Rights Follow-up Committee.
- Wu, Wei (伍巍). 2007. Yueyu 粵語 *Fang Yan* 方言 2. 167–176.
- Xianggang Lifahui (香港立法會). 2008. *Erlinglingbanian liuyue ershiri shangwu shiyishi zhi xiawu shiershi shishiwufen ju xing de neiwuweiyuanhui tebiehuiyi de zhuzi jiluben* (CB(2)2470/07-08 hao wenjian) 2008年6月20日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45分舉行的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CB(2)2470/07-08 號文件). Xianggang: Xianggang Lifahui 香港：香港立法會.
- Xianggang Sifajigou (香港司法機構). 2002. *Zai fayuan chengxu shang de faying yuwen shiyong wenti* (CB(2)415/02-03(01) hao wenjian) 在法院程序上的法定語文使用問題 (CB(2)415/02-03(01) 號文件). Xianggang: Xianggang Lifahui 香港：香港立法會.
- Xianggang Tebiezhengfu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0. Guojia Xianfari 國家憲法日. https://www.cmab.gov.hk/tc/issues/constitution_day.htm (accessed 24 February 2022).
-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Zhongguoyuyan ji Wenxue Xi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014. Xiandai biaojun hanyu yu yueyu duizhao ziliao 現代標準漢語與粵語對照資料庫. <https://apps.itsc.cuhk.edu.hk/hanyu/Page/Search.aspx?id=17092>. (accessed 25 February 2022).
- Zhan, Bohui (詹伯慧). 1990. Guanyu Guangzhouhua shenyin wenti de sikao — Zai Yueyu zhengyin zuotanhui shang de fayan 關於廣州話審音問題的思考——在粵語正音座談會上的發言 *Zhongguo Yuen Tongxun* 中國語文通訊 11. 8–13.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under the Hong Kong Law

Minghon Hsu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Cantonese is the mother tongue of most of the Hong Kong (“**HK**”) citizens, and their right to use oral Cantonese falls within thei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The HK law has stipulated that Chinese is an official language, but nowhere in the law expresses whether Cantonese falls within the meaning of “Chinese” in its oral aspect. Meanwhile, national laws have only given Mandarin an official status, with no mention of Cantonese and other Chinese dialects. In fact, what is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under the HK law? Adopting the leg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begins by analysing the legislative intent of and subsequent amendments to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which gives “Chinese” the status of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order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dinance involved the intention of giving Cantonese any legal status in HK. The analysis is followed by elaborations on the HK Court’s interpretations on the Ordinance in case precedents, which are legally binding under the common law legal system as adopted in HK, to see whether the Court has ruled on the status of Cantonese in HK. Eventually, this article is concluded by discussions on whether Cantonese has been given any legal status in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r through Court case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on how HK citizens’ rights to use Cantonese can be better reinforced.

Keywords

Cantonese, linguistic rights,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official languages, *Re Cheng Kai Nam Gary*

通訊地址：香港 薄扶林道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

電郵地址：hsuminghon@g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2年2月28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9月2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10月1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10月17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3年1月31日